

我国慈善捐赠企业所得税政策激励效应评估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断点回归设计的数量分析

曲顺兰 武嘉盟

(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2008年1月1日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慈善捐赠税前扣除比例由年度利润总额3%提高到12%,这一激励政策调整的力度是比较大的。那么,政策实际执行效果如何?是否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了真正的激励作用?以2008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选用2003-2014年在中国A股交易的2809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企业,运用序列组齐性检验、chow稳健性检验、断点回归设计的方法,对2008年以前和以后的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税前扣除政策进行效果评估。主要结论是: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税前扣除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绝对规模,受政策影响2007、2008年企业捐赠支出增长率大幅提升,以后逐步平稳;我国企业目前慈善捐赠倾向仍然较低,且单一的限额扣除激励政策降低了非外资企业慈善捐赠倾向;所得税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慈善捐赠激励效应存在差异,外资企业对现行慈善捐赠政策反向激励效应不显著。因此,需进一步优化税收优惠制度结构,注重制度安排的多元性。

[关键词] 慈善捐赠;政策评估;序列组齐性检验;chow稳健性检验;断点回归设计

[DOI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7.01.011

[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10(2017)01-0095-09

一、引言

关于企业所得税政策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激励,已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点。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政策的收入价格弹性分析、影响企业慈善捐赠支出相关因素分析和税收政策激励效应分析三大方面。

第一个方面,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政策的收入、价格弹性分析。最早运用边际分析法研究慈善捐赠企业所得税政策的是Schwartz(1970),他从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角度,运用经济学原理对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政策进行边际分析,认为企业捐赠支出与慈善捐赠价格负相关,与企业利润正相关^[1]。Nelson(1970)计算出企业慈善捐赠价格弹性区间为(-1.03, -1.18),收入弹性区间为(1.05, 1.43)^[2]。Clotfelter(1985)计算了企业慈善捐赠所得税政策的长期收入、价格弹性和不同行业的价格、收入弹性,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证明了联邦所得税政策决定了美国的慈善捐赠规模^[3]。Boastsman和Gupta(1996)对1984-1988年的212家捐赠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企业捐赠价格变化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企业捐赠支出与边际税率负相关^[4]。我国学者也针对本国企业的情况进行了分析。郭健(2008)计算出我国企业慈善捐赠价格弹性为-2.14^[5];朱迎春(2010)进行多元线性回归计算出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弹性区间为(0.283, 0.446),收入弹性为(0.559, 0.857)^[6];张奇林(2013)实证验证了企业所得税政策能够影响企业慈善捐赠,并且计算出企业慈善捐赠的所得税税率弹性系数区间为(0.4023, 0.7889)^[7];路春城等(2016)运用2014年A股交易的662家上市企业数据计算了企业所得税政策收入、价格弹性的基础上,提出企业规模越大税收激励效应越明显,企业捐赠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慈善捐赠税收激励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2BJL0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曲顺兰(1964—),女,山东栖霞人,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公共政策。

行为表现出公平偏好^[8]。

第二个方面,影响企业慈善捐赠支出的相关因素分析。Raimondo(1986)认为,应关注时滞因素对于政策的暂时性和长期性变化的影响,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对于不同形式企业所得税政策有不同的反应^[9]。Natalie(1996)认为,不同的捐赠方式会影响企业的税收待遇,进而影响企业捐赠行为的选择^[10]。崔树银(2010)认为,互利型慈善捐赠企业比利他型慈善捐赠企业更易于在税收激励下形成合理的慈善资源配置结构^[11]。曲顺兰、崔红霞(2013)认为,将公平偏好纳入税收激励机制的研究可以解决单一边际分析理论下捐赠动机难以解释的问题^[12]。刘露露(2013)进行相关性分析,认为企业经营状况、企业规模、企业成立年限、董事会规模、企业创新能力、税收政策和企业职工人数与企业公益捐赠行为呈显著关系,企业性质影响不显著^[13]。

第三个方面,税收政策激励效应分析。Clotfelter(2012)分析了美国的税收政策,认为美国易变的税收减免政策降低人们对相关政策的信任,减少了企业的慈善捐赠^[14]。朱迎春(2010)以2007年上市公司数据为例,实证分析认为2008年1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有正向激励作用^[15]。张甫军和胡光平(2012)就企业慈善捐赠的税收扣除额进行了分析,认为企业慈善捐赠的税收扣除并非越高越好,应根据企业慈善捐赠的流向制定有差别的税收扣除政策^[16]。史正保(2015)具体分析了我国慈善捐赠政策存在的问题,指出在所得税制的规范性与合理性方面有待改进^[17]。谢露(2016)认为,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的税前扣除上限改革之后,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加大慈善捐赠力度^[18]。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关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所得税、企业利润的边际分析以及影响企业慈善捐赠支出的相关因素分析方面,对慈善捐赠政策效应评估明显不足。目前,国内的税收激励效应研究有对新所得税政策的实证分析、对税收扣除政策的探讨,却缺少对我国新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果的量化分析。而正确量化、评估我国新旧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方面的政策,找出现行政策存在的不足,对于认识我国慈善捐赠

税收政策现状并进一步改革、完善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优惠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2007年3月16日颁布并于2008年1月1日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慈善捐赠税前扣除比例由年度利润总额3%提高到12%,这一激励政策调整的力度是比较大的。那么,政策实际执行效果如何?是否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了真正的激励作用?本文将运用序列组齐性检验说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存在结构性改变,进一步运用chow稳健性检验确定企业慈善捐赠结构性改变发生在我国慈善捐赠的企业所得税政策改革的时点(2008年),最后运用断点回归设计界定这种政策效应的方向与大小。

二、我国慈善捐赠企业所得税政策沿革

我国慈善捐赠的所得税政策主要分为两个时间段,主要的政策调整节点发生在2008年。

(一)2008年以前我国慈善捐赠的企业所得税政策

我国第一阶段比较成熟的慈善捐赠所得税政策是1993-1994年《企业所得税法暂行条例》。《条例》规定不同类型企业慈善捐赠在企业所得税上享有部分免税的税收优惠政策:金融、保险企业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税收减免限额为1.5%;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用于公益、救济性及文化事业的捐赠税收减免限额为3%;对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科普事业的捐赠税收减免限额为10%。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公益、救济性捐赠有关税务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拥有中国境内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可作为企业当期成本、费用列支”。这意味着,对于外商投资企业,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是没有扣除限额的,即可以全额抵扣。

(二)2008年以后我国慈善捐赠的企业所得税政策

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政策主要见于1999年9月1日实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第24条、2008年1月1日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1-53条等其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通知。对于一般营利性企业,《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

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 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此外,《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其他条款和《公益事业捐赠法》对企业捐赠的税收优惠适用原则作了详细的说明。

可以看出,2008 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政策在慈善捐赠方面做了重大调整。首先,现行政策取消了外资企业全额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统一了外资企业和非外资企业的优惠限额;其次,提高了金融企业的减免限额,金融、非金融企业的扣除限额均上调至 12%,既扩大企业范围又调高所有企业的税收优惠比例。因此,2008 年的这次重大政策调整对我国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带来的影响,需要进行实证研究来评估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政策的政策效应,发现现行政策是否存在不足。

三、我国慈善捐赠所得税政策实施效果分析

(一)样本数据说明

2008 年的企业所得税改革,一般企业慈善捐赠税前扣除限额由年度利润的 3% 提高至 12%,其中,外资企业由可全额抵扣调整为 12% 的优惠限额,金融企业限额由 1.5% 上调至 12%。据此,本文研究样本企业总体的同时划分为外资、非外资企业与金融、非金融企业作分组研究。本文选取 2003-2014 年中国 A 股交易的 2809 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企业,样本企业的慈善捐赠支出、利润总额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自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外资、非外资企业与金融、非金融企业的分类数据来自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2014 年样本企业的企业结构、捐赠支出结构见表 1。

表 1 样本企业结构与捐赠支出结构				
	企业数 (个)	企业数占比 (%)	捐赠额 (亿元)	捐赠额占比 (%)
金融企业	48.00	2.00	10.40	13.00
非金融企业	2761.00	98.00	72.41	87.00
外资企业	1013.00	36.00	29.26	35.00
非外资企业	1796.00	64.00	53.55	65.00
合计	2809.00	100.00	82.81	100.00

可以看出,外资企业、非外资企业企业数百分比与捐赠支出百分比差别不大,金融企业捐赠支出百分比却明显大于企业数百分比,金融企业虽然只有 48 家,但在慈善捐赠方面的支出却占我国企业当年

慈善捐赠总额的 13%,是我国重要的企业捐赠主体,这可能由金融企业特殊的资本结构决定的。

此外,2003-2014 年企业总体及分群体捐赠支出额与变化情况见图 1 和表 2。

表 2 2003-2014 年企业加总捐赠支出

年份	捐赠支出 总额(亿元)	捐赠支出 增长率(%)	年份	捐赠支出 总额(亿元)	捐赠支出 增长率(%)
2003	8.14	-	2009	76.91	2.96
2004	12.56	54.17	2010	72.37	-5.90
2005	13.93	10.95	2011	98.38	35.94
2006	15.36	10.22	2012	95.27	-3.17
2007	52.31	240.66	2013	90.22	-5.29
2008	74.70	42.79	2014	82.81	-8.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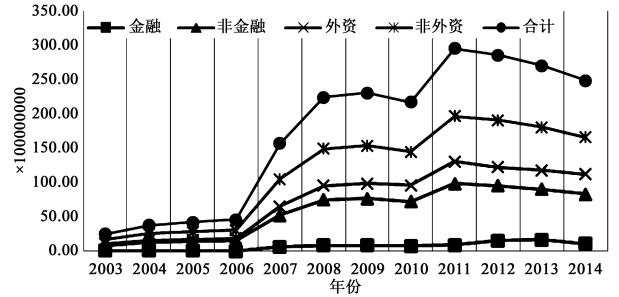


图 1 2003-2014 年企业捐赠额

从表 2 和图 1 均可以看出,2003-2006 年间我国企业慈善捐赠支出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但 2007 年 3 月 16 日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企业所得税》中有关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对这一年企业慈善捐赠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企业捐赠税收减免限额由 3% 提高到 12%,这个优惠对企业捐赠额的增加产生了实际性的影响,企业总体、非金融企业、外资与非外资企业慈善捐赠支出总额和增长比例显著上升。自 2008 年 1 月 1 日相关规定正式实施起,我国企业慈善捐赠支出经过一个持续上升通道,达到了一个较高的稳定水平。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优惠政策激励了我国企业慈善捐赠行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样本企业中金融企业比重较小,其慈善捐赠支出在图 1 中变化不明显,需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最后,企业利润总额是影响企业捐赠支出的重要变量^[11],慈善捐赠所得税政策也通过调整企业利润影响企业捐赠行为,观察企业捐赠支出与企业利润总额间的关系可以由两者的增长率的关系反映,如图 2 所示。

从图 2 可以看出,2007、2008 年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颁布及正式实施使企业捐赠支出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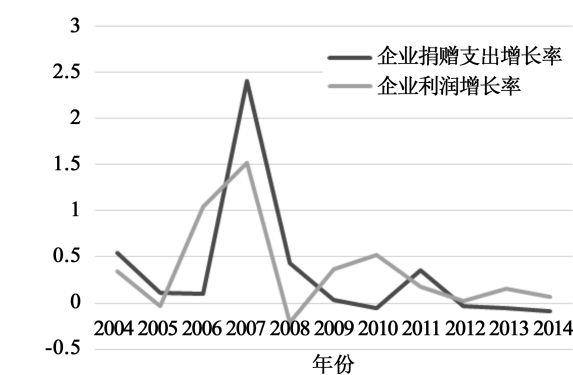


图2 企业捐赠支出增长率与企业利润增长率

显著提高,2008年后回归平稳,而且这种平稳增长是在一个新政策实施后带来的高捐赠规模基础上的增长。可见,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优惠政策激励了我国企业慈善捐赠支出在一个更高水平的平稳增长。

此外,图2、表2也反映了企业利润总额增长率与企业慈善捐赠支出增长率有相同的趋势。一方面,企业经营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这是企业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目标,只有达到了这一目标企业才能行使其社会责任,实现其公平偏好的目标。另外,慈善捐赠税前扣除使企业对外捐赠少缴一部分税款,捐赠成本大大降低,所以,慈善捐赠行为也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企业利润总额反映了企业的发展状况和提供慈善捐赠的能力,企业利润总额增长率越高,企业提供慈善捐赠的能力越强。但企业的慈善捐赠支出与其利润总额已并非是完全同步的,说明考虑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不能仅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研究,企业也是具有公平偏好的微观主体。所以,选择利润总额作为模型的回归变量既具有有效性,又可以避免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三)序列组齐性检验

为评估2008年政策改革前后样本企业慈善捐赠支出是否有结构性变化,现进行序列组分组齐性检验。本文根据时间标准把样本企业划分为2003-2007年与2008-2014年两组,对比两组间均值和方差是否有显著差异。

1.序列组均值齐性检验

对2003-2007年与2008-2014年样本企业进行总体和分群体均值齐性检验,假设为序列各组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采用t-test、Satterthwaite-Welch

t-test、Anova F-test、Welch F-test四种检验方法,检验结果见表3。从检验结果来看,四种方法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所有序列组间均值均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提高慈善捐赠税前扣除比例的政策改革显著改变了样本企业的慈善捐赠支出均值,显著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支出的整体平均水平。对于受政策影响最明显的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与外资企业、非外资企业的两个群体,其慈善捐赠的整体平均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见表3。

表3 企业捐赠支出均值齐性检验

企业\方法	t-test	S.W. t-test	Anova F-test	Welch F-test
金融企业	-4.853228 ***	-5.110470 ***	23.55382 ***	26.11691 ***
非金融企业	-7.866509 ***	-7.159202 ***	61.88196 ***	51.25418 ***
外资企业	-8.470075 ***	-8.297109 ***	71.74218 ***	68.84201 ***
非外资企业	-7.106776 ***	-6.431735 ***	50.50627 ***	41.36722 ***
企业总体	-7.832964 ***	-7.136680 ***	61.35533 ***	50.93220 ***

注:*** p<0.01, ** p<0.05, * p<0.1。

2.序列组方差齐性检验

对2003-2007年与2008-2014年样本企业进行总体和分群体方差齐性检验,原假设为序列各组方差不存在显著差异,采用F-test、Siegel-Tukey检验、Bartlett检验、Levene检验、Brown-Forsythe检验五种检验方法,检验果见表4。从检验结果来看,五种方法均不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所有序列组间方差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2008年政策调整前后样本企业总体的慈善捐赠支出波动水平并未显著改变,对于受政策影响最明显的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与外资企业、非外资企业的两个群体,其慈善捐赠支出的不同年份间波动水平也未发生改变。检验结果显示,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结构的其他宏观经济因素在样本时间区间内并未发生重大改变,可以认为现行企业所得税政策是近年影响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表4 企业捐赠支出方差齐性检验

企业\方法	F-test	Siegel-Tukey	Bartlett	Levene	Brown-Forsythe
金融企业	1.788583	0.811998	0.348681	0.918674	0.540365
非金融企业	3.065459	0.811998	1.394316	1.035851	0.117295
外资企业	1.253047	0.811998	0.055956	0.007849	0.251863
非外资企业	3.326420	0.811998	1.601508	0.891233	0.077993
企业总体	0.3047	0.4168	0.2444	0.3998	0.8996

注:*** p<0.01, ** p<0.05, * p<0.1。

根据序列组齐性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2008年前后影响样本企业慈善捐赠支出的非政策宏观经济

因素并未有结构性变化,表现为不同年份间企业慈善捐赠支出的波动水平并未发生变化;2008 年政策改革前后样本总体、受影响最明显的行业群体的慈善捐赠支出整体平均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表现为序列组间均值具有显著差异。

(四)chow 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通过 chow 稳健性检验确定时间序列突变点为 2008 年。选择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慈善捐赠

支出,解释变量为企业利润总额,进行线性回归并检验利润总额系数的稳健性特征,用以解释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优惠政策是否改变了企业的慈善捐赠倾向。提出 chow 稳健性检验假设,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在 2008 年前后并未显著改变。

为全面评估政策效应,同时对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与外资企业、非外资企业这两组受政策影响最大的企业群体进行分群体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5。

表 5		chow 稳健性检验				
		金融企业	非金融企业	外资企业	非外资企业	企业总体
常数项		0.8629 (1.1600)	6.8200 (8.2900)	2.3600 (2.7400)	11.7000 * (6.0000)	14.1000 (8.3500)
利润总额		0.000771 *** (0.000118)	0.005036 *** (0.000815)	0.004085 *** (0.000627)	0.002265 *** (0.000385)	0.002669 *** (0.000419)
R2		0.811066	0.792627	0.809260	0.776085	0.802371
R2-a		0.792172	0.771890	0.790186	0.753694	0.782608
F-statistic		42.92843 ***	38.22232 ***	42.42740 ***	34.65987 ***	40.59991 ***
Chow 统计量		1.624666	19.37994	25.52044	14.91161	19.90524
	Prob	0.2558	0.0009	0.0003	0.0020	0.0008

注:1.*** p<0.01, ** p<0.05, * p<0.1;2.括号内为标准误。

从表 5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回归模型 R²与调整的 R²均在 80%左右,模型整体拟合情况良好;参数的 t 统计量 Prob.均小于 0.01,参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chow 统计量 Prob.值除金融企业外均小于 0.01,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可认为突变时点(2008 年)前后模型系数发生了变化,企业慈善捐赠倾向发生了结构性改变。2008 年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优惠改革显著地激励了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金融企业的 chow 稳健性检验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不能接受原假设。金融企业 Chow 稳健性检验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 A 股上市企业中金融企业在 2014 年仅有 48 家,故样本对金融企业的总体的代表性不足,应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对金融企业重新选取样本数据,采用大样本进行分析。

从利润总额的系数可以看出,各方程的利润总额系数均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其中,外资企业具有最高的慈善捐赠倾向。普遍较低的利润总额系数说明,我国企业的慈善捐赠倾向普遍不高,慈善捐赠支出在企业经营中占的比重很低,大部分企业可能尚未达到慈善捐赠减免 12%的减免限额,相对量仍然处于低水平。而金融企业慈善捐赠支出在企业总利润所占比例较小,所以受政策变化影响较小,这也是金融企业 chow 稳健性检验不显著的一方面原因。

综上所述,2008 年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优惠改革显著地激励了企业总体的慈善捐赠行为,仅有金融企业检验不显著,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五)断点回归设计

通过 chow 稳健性检验,已经确定了企业捐赠行为的结构突变点为 2008 年,政策改革明显地改变了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下文通过引入年份虚拟变量 Y2008,进行断点回归分析确定现行企业捐赠政策的政策效应的方向与大小。定义虚拟变量 Y2008,其中 2003-2007 年变量 Y2008 的值为 0,2008-2014 年变量 Y2008 的值为 1。为对现行慈善捐赠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慈善捐赠倾向进行分析,即应考虑虚拟变量 Y2008 的加入对利润总额系数的影响,故加入交互项利润总额×Y2008。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年份区间的企业分别建立模型进行 OLS 回归。

建立混合横截面数据模型:

$$DONA_i = \beta_0 + \beta_1 \times PRO_i + \beta_2 \times Y2008_i + \beta_3 \times PRO_i \times Y2008_i + \varepsilon_i$$

其中,DONA 为企业捐赠支出,PRO 为企业利润总额,由于慈善捐赠所得税政策主要是税前抵免的形式,选择企业利润总额更能说明企业的捐赠动机。混合横截面模型主要适用于对样本中 2003 年已经成立的金融企业,由于其样本数量少,采用固定

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会导致较大偏误,故仅对其运用混合横截面数据模型。

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DONA_{it} = \beta_{i0} + \beta_1 \times PRO_{it} + \beta_2 \times Y2008_{it} + \beta_3 \times PRO_{it} \times Y2008_{it} + \varepsilon_{it}$$

建立随机效应模型:

$$DONA_{it} = \beta_0 + \beta_1 \times PRO_{it} + \beta_2 \times Y2008_{it} + \beta_3 * PRO_{it} \times Y2008_{it} + u_i + \varepsilon_{it}$$

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进行选择。其中,固定效应模型中 β_{i0} 表示个体的异质性导致的不同截距,随机效应模型中 u_i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效应,其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

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时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时间成立的企业是有系统性差异的。首先,样本企业的总体企业结构会发生变化。例如,2003 年金融企业、外资企业的数量与 2008 年前后是有显著差异的,因而税收政策中就金融企业、外资企业调整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对金融企业的优惠政策由于 2003 年金融企业数量很少可能影响不大,但同样的政策由于 2008 年金融企业数量快速增加,就会有更显著的影响。所以,即使在回归结果中发现 2008 年后企业捐赠支出增加,我们也难以判断是政策效应还是样本企业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另一种情况导致样本企业系统性差异的情况是,由于企业规模、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同样的捐赠支出在 2003 年与 2014 对企业的意义是不同的。这可能导致政策的激励效应对 2014 年企业捐赠行为与 2003 年的大不相同。

为了避免这种企业系统性差异带来的偏误,我

们进行断点回归设计,随着时间窗口的不断缩小,这种企业的系统性差异就会越来越小,模型的精度也就越来越高。为此我们在表 6 至表 8 的回归中不断地缩小时间窗口,其中第一个回归比较 2003-2007 年与 2008-2014 年企业的捐赠行为变化,第二个回归比较 2006-2007 年与 2008-2009 年企业的捐赠行为变化,第三个回归比较 2007 年和 2008 年企业的捐赠行为变化。

同时,由于不同年份企业数量不同,为保证样本数量和模型精度,根据关键变量观测值的完整性标准(关键变量主要包括企业捐赠支出、利润总额、企业所得税额及企业的成立年份等),我们分别对三次回归进行三次独立样本筛选。例如,某企业 2006 年成立,我们加入第二、三次回归,不加入第一次回归,这样就会减小企业总体结构的变化带来模型的偏误。经筛选,最终第一、二、三次回归中样本企业的数量分别为 264 家、574 家、912 家。

对于企业总体而言,所有回归虚拟变量 Y2008 前的系数均显著地为正,说明 2008 年政策前后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规模有显著的提高。第一次回归中,交互项 $PRO_{it} \times Y2008_{it}$ 前系数为负,第二次回归中为正,对三次回归中显著地为正,这种回归结果的不同就源自于不同时间成立的企业的系统性差异。随着时间窗口的不断缩小,这种系统性差异不断减小,政策改革对企业捐赠行为的激励效应越来越明显。这充分说明了进行断点回归设计,不断缩小时间窗口,排除企业系统性差异因素的必要性。从单个参数的显著性来看,在表 8 即第三次回归结果中,所有参数系数均在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显著为正。模型回归结果验证了 chow 稳健性检验的检验结果,可

表 6 2003-2007 年 VS 2008-2014 年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金融企业	非金融企业	外资企业	非外资企业	企业总体
利润总额	0.000735 * (0.000456)	0.002299 *** (0.000161)	0.002610 *** (0.001431)	0.0000236 (0.0000901)	0.002269 *** (0.000159)
Y2008	847716.6 (1315751)	3134625 *** (370562.8)	2856814 *** (394305.8)	3838018 *** (600298.3)	3103817 *** (366922.2)
利润总额 * Y2008	0.000335 (0.000530)	-0.000402 *** (0.0000922)	-0.000417 (0.000407)	-0.0000515 (0.0000996)	-0.000393 *** (0.0000915)
R ²	0.419914	0.920841	0.13042	0.021748	0.920692
R ² -a	0.365531	0.913582	0.128401	0.02016	0.913420
F-statistic	7.721421 ***	126.8549 ***	64.59165 ***	13.69469 ***	126.6087 ***
固定/随机效应	None	Fixed	Random	Random	Random

注: 1.***p<0.01,**p<0.05,*p<0.1; 2.括号内为标准误;3.所有回归固定、随机效应模型选择均通过 Hausman 检验。出于节约篇幅且各个体常数项系数研究价值不大,本表未报告各常数项系数。

表 7 2006-2007 年 VS 2008-2009 年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金融企业	非金融企业	外资企业	非外资企业	企业总体
利润总额	0.000868 (0.000546)	-0.0003 * (0.000186)	0.002086 *** (0.000393)	0.005025 *** (0.00013)	-0.0000101 (0.000044)
Y2008	1726872 (2659898)	2994807 *** (409763)	2489528 *** (436172.5)	3165631 *** (629353.5)	930364.4 *** (301222.2)
利润总额 * Y2008	0.003013 *** (0.000814)	0.000608 *** (0.000141)	0.001532 *** (0.000391)	0.001100 *** (0.000169)	0.0000532 (0.000115)
R ²	0.831897	0.881314	0.149260	0.487804	0.519675
R ² -a	0.789871	0.841543	0.146568	0.486657	0.457023
F-statistic	19.79493 ***	22.15986 ***	55.44140 ***	425.3947 ***	8.294735 ***
固定/随机效应	Random	Fixed	Random	Random	Random

注：同表 6。

表 8 2007 年 VS 2008 年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金融企业	非金融企业	外资企业	非外资企业	企业总体
利润总额	0.004302 *** (0.000162)	0.004009 *** (0.0000915)	0.001904 (0.002323)	0.004011 *** (0.000732)	0.004031 *** (0.0000899)
Y2008	6302443 *** (2032313)	2420825 *** (877381.7)	544494.3 (1521908)	3029920 *** (1131189)	3029920 *** (1131189)
利润总额 * Y2008	0.000275 *** (0.0000689)	0.00000723 (0.000143)	0.002417 ** (0.001349)	-0.002715 ** (0.000828)	0.000206 *** (0.000121)
R ²	0.965659	0.545389	0.557389	0.952640	0.689710
R ² -a	0.960508	0.544629	0.108844	0.934880	0.688838
F-statistic	187.4633 ***	718.2092 ***	1.242661 ***	53.63936 ***	791.3130 ***
固定/随机效应	Random	Random	Fixed	Random	Random

注：同表 6。

以认为 2008 年政策前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确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并非仅仅简单支出水平的提高,2008 年政策改革有效地激励了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其虚拟变量 Y2008 及交互项前系数与企业总体情况基本一致,为避免重复,这里不再重复说明。对于金融企业,所有回归的各参数系数均为正值,随着时间窗口的缩小,其显著性水平不断提高,说明 2008 年政策改革有效地激励了金融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

从表 8 中可以看出,各群体慈善捐赠结构与总体慈善捐赠结构在回归模型中基本一致,现以企业总体为例对现行政策效应方向和大小进行分析。企业利润总额系数为 0.004031,说明企业的边际慈善捐赠倾向较低,利润总额每增加 1000 元,企业的慈善捐赠支出仅仅平均增加 4 元。这说明我国慈善捐赠建设仍然不足,企业慈善捐赠意识仍然不强,仍需进一步宣传发展。虚拟变量 Y2008 的系数为 3029920,说明我国 2008 年企业捐赠支出规模比 2007 年前平均提高三百万元,我国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在不断扩大,我国现行所得税慈善捐赠优惠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企业已经开始重视企业的慈善捐赠方面的支出。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非外资企业总体 Y2008×利润总额前的系数为-0.002715,为负数,且参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政策,在增加了企业慈善捐赠支出总体规模的情况下,降低了非外资企业利润总额的边际慈善捐赠倾向。但相对应的这次慈善捐赠政策改革中抵免限额减少的外资企业却并未降低边际慈善捐赠倾向。非外资企业总体每年利润总额每增加 1000 元,企业慈善捐赠支出将比 2008 年以前平均少捐赠 2 元。这一发现事实上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的捐赠意识相对更强,我国慈善捐赠建设仍有待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非外资企业的政府统计的企业间接慈善捐赠支出相对比重在下降,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优惠政策包括对向政府相关部门的间接捐赠与向法律规定特定社会群体的捐赠的抵免优惠,直接捐赠、实物捐赠是无法享受税收优惠的,而我国企业很大一部分慈善捐赠支出是来自于直接捐赠、实物捐赠等其他捐赠形式。正如 Natalie (1996)^[10]所指出的,企业不同的捐赠方式会带来企业不同的税收待遇,也将树立不同的企业形象。企业边际慈善捐赠倾向的下降说明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享受政策抵免的慈善捐赠支出比重在

相对下降,企业是具有公平偏好的主体,并非仅仅追求企业的税收优惠。企业有动机选择直接捐赠来树立企业形象,所以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优惠政策需要进一步适应企业捐赠方式多元化的要求,对不同的捐赠方式实行多元化的慈善捐赠政策激励。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为评估现行慈善捐赠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激励效应,本文利用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中慈善捐赠税前扣除比例提高这一时间节点,选用2003-2014年在我国A股市场交易的2809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企业,运用序列组齐性检验、chow稳健性检验、断点回归设计的方法实证检验了2008年前后企业所得税慈善捐赠优惠政策的政策改革的效应,主要结论是:

第一,现行企业所得税政策显著激励了企业的慈善捐赠支出。每年平均增加企业慈善捐赠支出绝对额三百万元,提高了企业的慈善捐赠规模均值。从增长率来看,2007、2008年效果比较明显,企业慈善捐赠支出增长率大幅提高,并在随后几年中趋于平稳。特别是2007年受政策发布的影响,比2006年增长了240.66%,效果非常明显。2008年的增长,有汶川地震大额捐赠的因素,但2008年后企业慈善捐赠支出稳定于较高水平,故政策调整的影响也很明显。

第二,企业利润总额增长与慈善捐赠支出增长基本同步,但相对于企业利润总额,企业慈善捐赠支出比重较小。虽然我国目前慈善捐赠的主要力量是企业,但企业慈善捐赠支出增长速度相对于企业利润总额规模增长速度还是比较慢,企业慈善捐赠倾向为0.004031,且现行的慈善捐赠税前扣除较低比例限额、激励形式单一的限制,降低了非外资企业慈善捐赠倾向,约0.002715。

第三,不同类型企业对所得税政策激励效应存在群体性差异,与其他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对现行慈善捐赠政策改变并未表现出捐赠支出减少。

这些结论表明,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我国企业对慈善捐赠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企业的公平偏好与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慈善捐赠支出绝对规模在不断

扩大,但同时企业慈善捐赠的相对水平仍然不足,随着企业第一目标利润最大化的不断实现,公平偏好和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也是企业不断追求的,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仍有进一步政策激励的空间。造成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相对较低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仅有慈善捐赠的所得税税前扣除,且有限额限制,激励手段单一,而且只有向政府相关部门的间接捐赠与向法律规定特定社会群体的捐赠才享受税前扣除优惠,直接捐赠、实物捐赠是无法享受税收优惠的。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所以应对不同类型企业实行不同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直接捐赠、实物捐赠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放宽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条件,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来调节不同企业主体的慈善捐赠行为。

最后,非外资企业边际慈善捐赠倾向降低的发现说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受企业公平偏好的影响,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不仅仅依靠利润最大化模型可以解释,故下一步研究应加入企业公平偏好因素。此外,金融企业作为在我国企业慈善捐赠支出中占有较大比重的一类企业,对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反应的不显著也需进一步的研究揭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参考文献:

- [1] A. Robert Schwartz. Personal Philanthropic Contribution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0, (78) .
- [2] L. Ralph Nelson.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Growth of Corporation Giving [Z].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Occasional Paper 111, 1970.
- [3] C. T. Clotfelter. Federal Tax Policy and Charitable Giving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 [4] Boatsman, James R. , Sanjay Gupta. Taxes and Corporate Char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Micro-Level Panel Data [J]. National Tax Journal, 1996, 49 (02) .
- [5] 郭健. 社会捐赠及其税收激励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 [6] 朱迎春. 我国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激励效应——基于2007年度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J]. 当代财经, 2010, (01): 36-42.
- [7] 张奇林, 黄晓瑞. 税收政策是否可以促进企业慈善

捐赠探讨[J]. 财政论坛,2013,(01):39-46.

[8]路春城,武嘉盟,郑斌. 企业所得税政策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J]. 经济与管理评论,2016,(03):110-117.

[9]Raimondo, Henry J. Federal Tax Policy and Charitable Giving (Book Review) [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1986, (53).

[10]Natalie J. Webb. Corporate Profit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Subsidization" of Corporate Income Under Charitable Giving Tax Laws[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1996.

[11]崔树银. 关于拓宽企业慈善捐赠渠道的思考[J]. 当代经济管理,2010,(10):35-38.

[12]曲顺兰,崔红霞.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文献述评及研究展望[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3,(06):91-97.

[13]刘露露.我国企业公益捐赠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J]. 财会通讯,2013,(05):100-102.

[14]Charles T. Clotfelter. Charitable Giving and Tax Policy in the U.S. [J]. the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2012,(05).

[15]朱迎春. 新企业所得税法对我国企业慈善捐赠影响的统计分析[J]. 现代财经,2010,(02):82-87.

[16]张甫军,胡光平. 优化企业慈善捐赠税前扣除政策的探讨[J]. 财会月刊,2012,(05):25-27.

[17]史正保. 我国企业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制度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2012,(65):43-51.

[18]谢露,邓英雯. 企业所得税改革与企业慈善捐赠[J]. 财政研究,2016,(04):93-104.

(责任编辑:宋 敏)

Evaluation on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Policy of Charitable Donation ——Based on Discontinuity Regression Design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QU Shunlan, WU Jiameng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Enterprise Income Tax Law implemented in January 1, 2008 raised the proportion of the tax deduction for enterprises' charitable donations from the 3% of total annual profit to 12%. It is an obvious policy adjustment and we hope to know whether it has a real incentive effect on corporate charitable giving. Taking 2008 as a time point, selecting 2809 samples from 2003-2014 Chinese trading A shares, we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tax deduction policy before and after 2008 by using the equality test, chow breakpoint tests and dummy variable regress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 The current tax policy enlarges the absolute scale of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spending, the donation spending in 2007 and 2008 increased obviously and then kept stable; The willingness of corporate donation is still low and the current simple tax deduction policy reduces the propensity of donation of the domestic corporate; The current income tax policy has different incentive effect on different types of corporate and the financial enterprises have no significant incentive reaction to the current charitable donation policy. Therefore, we should further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tax policy system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versity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Key Words: Charitable donation; Policy evaluation; Test of equality; Chow breakpoint tests;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